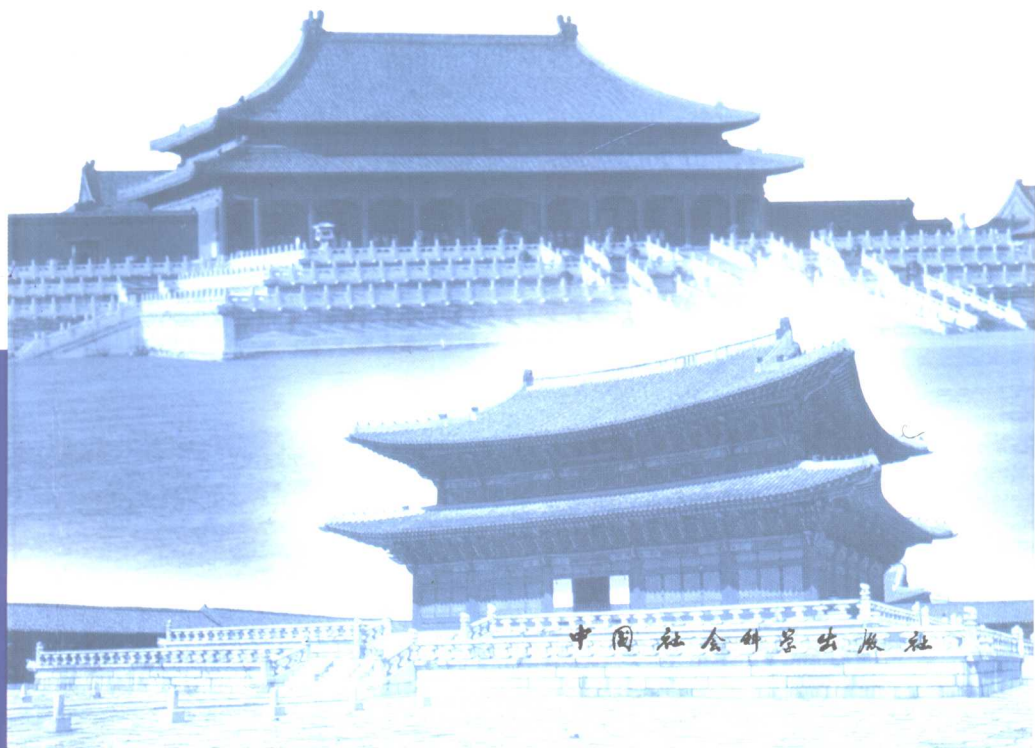


韩国近代外交 与中国 (1861-1910)

王明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

(1861—1910)

王明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F88/04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1861—1910)/王明星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

ISBN 7-5004-2386-1

I. 韩… II. 王… III. ①外交史-韩国-1861—1910 ②中外关系-韩国-1861—1910 IV. D83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55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5.00 元

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韩国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庄锡昌

委 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源华(常务) 朴昌根 任 晓

庄锡昌 周明伟 金光耀

黄美真 杨立强

本期执行主编:石源华 金光耀

总 序

大约在 100 年以前,韩国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隐士之国”,该国的情况还鲜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西方人士知之甚少。当时,欧美人士只知道这是一个远在地球东端边远地区无比寒冷的国家,那儿居住着一批信仰奇特宗教的神秘的居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经过近百年的沧桑,风风雨雨,剧烈变迁,如今的韩国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国家。

回顾韩国人民经历的最近百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前 50 年是争取国家独立、摆脱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该民族的奴役,创建民族独立国家的过程;后 50 年是努力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力争使国家与民族踏入世界现代化行列的过程。

韩国人民用他们的英勇奋斗与艰苦劳动为本民族争得了独立和富强,也赢得了世人的尊敬与赞扬。

韩国与中国是邻邦,又有着数千年的交往历史。按理说,中国人民对这么一位邻居应该知之甚多、知之甚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制约,中韩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一度被割断了数十年。中韩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被限制在最小最简的限度之内。因此,原本不应该如西方人那样把韩国视为遥远的“隐士之国”的中国人也把韩国视为一个十分陌生的国度,尤其是今日年轻一代中国人对其了解甚少。

1992 年 8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双方为对方打开门户以后,中国的“韩国学”、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立即兴起,并且蓬勃发展。这表明两国人民是多么渴望真切地了解对方。正如久违数十年的两位故旧好友,突然道途重逢。此时他们是惊和喜,询问是否别后

无恙；然后则是急切地探悉彼此别后的遭遇与目前的境况。初始的激动心情平静以后还会探讨一下彼此之间是否有可能给予对方什么支持和帮助。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往当然不会像朋友之间私交那么简单与朴实，肯定要复杂得多。但是，有一点还是十分相似的，即彼此会急切地希望更多地了解对方的真情实况。1992年10月，即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两个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了。在这以后复旦大学校内的许多朋友，还有一些校外的朋友，非常积极地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在此以后短短的几年内，围绕韩国问题或与韩国有关的问题，我们召开了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报告会……还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会议参加者、著作撰稿者都十分踊跃。还有一批年轻朋友来复旦大学做博士生、硕士生，专心研究韩国问题。这一情况出乎我们原先的预料。

再环顾一下周围，可以发现在这短短一段时期国内陆陆续续建立了多处韩国问题研究中心，“韩国学”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成长。这正好说明今日中国境内的环境与气氛适合“韩国学”研究的发展。

这一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人们对“韩国学”给予那么多的关注，是有许多理由的，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条是我们应该大力发展“韩国学”研究的：

其一，韩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生活内容的国家，这是世界上众多文化智慧宝库中的一座，而且有她自己独到之处，人们从这儿可以学习到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人类的智慧。

其二，中韩两个民族是相处数千年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密切的交往，从而也留下了诸多的历史问题，如何科学地、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对于巩固与发展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极为重要。

其三，在近代，中韩两个民族还具有一段极其相同的历史遭遇，因而结下了互助互援、共同抗敌，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血肉之

情。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值得发掘与交流。这是我们两个民族共同的珍贵历史遗产。

其四,中韩两国过去几千年间社会形态、历史演变途径以及近代的历史命运较为类同,然而在最近 30 多年里,韩国率先跨出了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步伐,走得又相当成功。韩国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乃至教训,对今日的中国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作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种借鉴。

其五,为了在两个民族之间建立牢固的友谊,必须彼此充分地理解,而彼此深刻理解的基础就是彼此全面的了解。要了解就必需展开研究。彼此应该深入地研究对方,以求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对方。一言以蔽之,为了两国的友谊,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我们也必须开展韩国学的研究。

当然还可以举出许多的理由。

正是从这种种理由出发,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我们团结了一批朋友,从历史、现状的诸多方面展开韩国问题的研究,并出版了《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丛书》,丛书的内容涉及韩国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外交以及中韩关系等等方面。现已出版专著十余本,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丛书的出版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关怀,也得到许多朋友的鼓励与好评,使我们很受鼓舞。我们计划一如既往,继续编纂这套丛书。承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支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所裨益。

庄锡昌

1997年10月14日

序 言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东亚国际格局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在这场历史剧变中,延续千年之久的东亚华夷秩序彻底土崩瓦解,古老的“天朝上国”——中国,悲壮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随之东亚完全被纳入西方近代外交体制。

东亚华夷秩序的解体,为朝鲜民族的独立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然而,不幸的是,这场历史剧变不仅没能吹响韩国近代化的历史号角;相反,却将韩国推入了殖民地的万丈深渊。

近代韩国的历史命运为何会如此悲惨?今天我们来反思这段历史,深刻剖析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韩国外交政策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对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近代东亚国际关系,总结韩国近代化失败的沉痛教训,设计并构筑面向 21 世纪的东亚国际新秩序,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欲客观、公正地研究韩国近代外交政策,首先必须克服一种错误观念——“东亚无外交”。这种观点认为:在传统的东亚华夷秩序中,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宗藩关系严格地说不是外交关系,而是一种封建从属关系;东亚诸藩属国之间只存在“通信”关系,也不存在外交关系;而朝鲜是传统东亚华夷秩序中一个最重要的藩属国,因此在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朝鲜无外交可言。这种观点的流传,给近代韩国外交问题的研究带来了两种不良倾向:(1)把朝鲜看作是惟清廷是从、任人宰割的附属国,完全抹煞了朝鲜外交的自主性和朝鲜民族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光荣传统。(2)夸大了清廷在朝鲜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近代韩国外交失误的责任全部推给清廷。

所谓“东亚无外交”之说,源于对近代西方外交秩序和古代东

亚华夷秩序教条主义的理解。西方近代外交秩序奉行的首要信条即国家主权原则,附属国和殖民地是无国家主权可言的,由此产生了所谓“属国无外交”之说。然而,众所周知,古代东方华夷秩序不同于西方近代外交体制,前者是一种封贡关系,后者是一种统属关系。前者只重名分上的宗藩关系,实际上只要不危及东亚华夷秩序的稳定和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一般不干涉其藩属国内政外交;后者则是一种政治上统治与被统治,经济上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因此,西方近代外交体制中“属国无外交”之说不适用于 1894 年以前的朝鲜。

诚然,古代东亚华夷秩序中自古也有“诸侯无外交,不二君也”之说。但是,早从春秋时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所谓“诸侯无外交”之说便失去了约束力。“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不仅可外交,甚至还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所谓“诸侯无外交”之说便不行于古代东亚华夷秩序。不仅如此,中国王朝往往要求其藩属国要劝诱别的“化外”之国前来朝贡。只要这种外交活动不至于导致“二君”现象,中国就不加以干涉。因为,这一般还有利于宣扬“天朝上国”的声威。由此可见,所谓“东亚无外交”与历史事实不符,只能说古代东亚外交关系不同于近代西方外交体制下的外交关系。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华夷秩序下近代韩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否则,将难以对近代东亚国际关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笔者认为,1861 年“对马危机”的发生标志着近代东亚国际舞台上“朝鲜问题”的发端,同时也就标志着韩国近代外交的开始;而 1910 年《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近代韩国的亡国,同时也就标志着韩国近代外交的结束。在近代韩国 50 余年的外交史中,对其外交政策产生过影响的外部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1)中国政府;(2)日本政府;(3)俄国政府;(4)西方列强,主要是英、美、德诸国。毫无疑问,相对而言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种因素。这就是本书选题的主要依据。

韩国近代外交实质上是朝鲜挣脱清廷的束缚,逐渐走向独立自主的历史。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将韩国近代外交 50 余年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1)1861—1873 年为第一阶段,是攘夷锁国阶段。大院君的这一政策一方面延缓了朝鲜迈向近代世界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为反对西方列强入侵的民族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在此期间,清廷先是按传统惯例,替朝鲜代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交涉;为推脱责任,后来又声称“任其自主”。(2)1874—1882 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不到 10 年的时间内,朝鲜逐渐从锁国走向开国。近代朝鲜从锁国走向开国的历史与中国极为相似,经历了一个由被迫开国向自觉开国转变的过程。1876 年,日本用武力打开了朝鲜的国门,1882 年《朝美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朝鲜自觉全面的开国。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朝鲜的开国是清廷推行“以夷制夷”外交政策的结果。笔者认为,近代朝鲜全面开国的决定性因素是其国内开化意识的觉醒。(3)1882—1894 年为第三阶段,力争自主是这一阶段朝鲜外交的主要特点。《朝美条约》签订后,朝鲜便以自主国的名义先后与欧美列强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适应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在名义上保持中朝藩属关系的前提下,朝鲜政府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初步实现了外交体制的近代化,并充分利用清廷与西方列强在朝鲜事务中的矛盾使之相互牵制,以求推进自主外交。相反,为了维护自己东部边境的安全,清廷对朝实施全面干涉政策,极力阻挠朝鲜自主外交的发展。(4)1894—1910 年为第四阶段,是朝鲜政府寻求中立的阶段。1894 年甲午战争中清廷败于日本并被迫宣布放弃中朝藩属关系,这标志着东亚华夷秩序的彻底解体。清廷势力退出朝鲜半岛。但是,由于日俄两国乘机加紧向韩国扩张,使之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为此,韩国政府开始实施中立外交。然而,由于韩国国力的软弱和国际局势的险恶,韩国政府的中立外交以失败而告终。1910 年日本政府将《日韩合并条约》强加于韩国,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这同时也宣告了韩国近代外交的彻底失败。

目 录

总序	庄锡昌 (1)
----------	---------

序言	(I)
----------	-------

第一章 锁国攘夷(1861—1873 年)	(1)
-----------------------------	-------

第一节 “事大以礼,交邻以诚” ——古代朝鲜的外交政策	(1)
--------------------------------------	-------

一 古代东亚人的天下观	(1)
-------------------	-------

二 东亚华夷秩序	(5)
----------------	-------

三 李氏朝鲜的“事大交邻”外交	(11)
-----------------------	--------

第二节 华夷秩序面临挑战	(18)
--------------------	--------

一 两种外交体制的冲突	(18)
-------------------	--------

二 洋炮轰开中华门	(24)
-----------------	--------

三 列强蚕食东亚	(28)
----------------	--------

第三节 国门紧闭的“隐士之国”	(30)
-----------------------	--------

一 朝鲜成为东北亚争衡焦点	(30)
---------------------	--------

二 禁教与驱逐“洋夷”	(37)
-------------------	--------

三 拒绝日本的调停	(46)
-----------------	--------

第二章 开国通商(1874—1882 年)	(56)
-----------------------------	--------

第一节 被迫开国	(56)
----------------	--------

一 朝日“书契之争”	(56)
------------------	--------

二 锁国政策的动摇	(61)
-----------------	--------

三 江华岛事件与《江华条约》	(66)
----------------------	--------

第二节 开化意识的觉醒	(73)
一 华夷秩序的全面危机	(73)
二 清廷朝鲜政策的转变	(75)
三 开化思潮的兴起	(80)
第三节 “决意外交”	(83)
一 划时代的抉择——开国	(83)
二 力促清廷介入朝美谈判	(89)
三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	(95)
第三章 力争自主(1882—1894 年)	(104)
第一节 自主意识的萌生	(104)
一 开化势力的增强	(104)
二 国权意识的高扬	
——国际法的传入及其影响	(106)
三 清廷的干涉政策	(109)
第二节 向近代外交体制的过渡	(117)
一 “事大交邻”外交体制的解体	(117)
二 尝试对华外交	(120)
三 龙旗与太极旗之争	(123)
第三节 夹缝间求生存	
——穿梭于大国之间的自主外交	(127)
一 “甲申政变”与朝日《汉城条约》	(127)
二 “朝俄密约”与巨文岛事件	(136)
三 派使风波	(143)
第四章 寻求中立(1895—1910 年)	(156)
第一节 获得“独立”	(156)
一 华夷秩序的崩溃	(156)
二 大韩帝国的建立	(160)

三 面临被瓜分的危险·····	(161)
第二节 步履艰难的中立外交·····	(165)
一 朝鲜中立设想的提出·····	(165)
二 形形色色的中立化方案·····	(170)
三 中立外交的尝试·····	(172)
第三节 中立幻想的破灭·····	(177)
一 两强对峙局面的失衡·····	(177)
二 日本独霸朝鲜·····	(181)
三 中立外交的破产·····	(185)
 结束语·····	 (193)
 后记·····	 (196)
 韩国近代外交大事记(1861—1910年)·····	 (198)
 主要参考文献·····	 (217)

第一章 锁国攘夷

(1861—1873 年)

李氏朝鲜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固守东亚华夷秩序下传统的“事大交邻”外交方针。19 世纪 60 年代，当以武力叩开了中国国门的欧美列强纷纷将其蚕食东亚的矛头对准朝鲜之际，执政的大院君政权顽固地坚持彻头彻尾的锁国攘夷政策，拒绝东邻日本的复交请求，同时接连击退了前来叩关的法美舰队。从而使朝鲜成为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初，东亚惟一个仍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

第一节 “事大以礼，交邻以诚”

——古代朝鲜的外交政策

一 古代东亚人的天下观

人们总是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能力的前提下，认识自己所生存的客观世界的。在徒步奔走于中原地带的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天圆地方”的空间里，像锅盖似的圆形天空靠着四根擎天柱的支撑笼罩着方而平的大地，只是由于大力神共工盛怒之下的一头撞击，才使得“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所以，他们将自己所生存的空间称之为“天下”，因此他们的世界观也称之为“天下观”。

古代东方人“天下观”的基础和核心是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居住于天下中央的是具有最先进文化的中国

人，中国又称“中华”、“华夏”。中华为“天下之共主”。居住于天下边远之地的则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之民，具体说来即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蛮夷为中华之藩属。

华夷之说早在夏商时期即已出现，但是系统的华夷观念却是随着西周礼乐体制社会的建立，才形成于春秋时代的。后来，尽管人类的交往能力不断提高，人们所认识的“天下”也随之逐渐扩大；然而，“华夷之辨”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的天下观也依然如故。直到明代万历年间，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还是这样的：天下的中央为陆地，四周为海洋。在中央陆地上分布着大明帝国的 15 个省，其四周海洋中散布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的面积合在一起还不如明帝国最小的一个省面积大。^[2]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利玛窦对当时中国人的天下观作了如下阐述：“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就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3]清代中国人仍认为：“中国居大地之中，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4]不仅如此，这种天下观还对东亚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如：成书于 1471 年、朝鲜人申叔舟所编《海东诸国记》中有：“待夷狄之道，不在乎外攘而在乎内修，不在乎边御而在乎朝廷，不在乎兵革而在乎纲纪。”^[5]1672 年，日本学者熊泽番山在《集义和书》中指出：“中夏为天地之中国，据四海之中。……南称蛮，似虫也；西称戎，似犬也；北称狄，似兽也；东称夷，似人也，为四海中之杰。……然而中夏之外，四海之内，及日本之国者无。”^[6]显然，华夷观念不仅是古代中国人，同时也是古代东亚人所共有的天下观的基础和核心。它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1. 尊华卑夷，内夏外狄。华夷观念的实质是强调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诗书礼乐法度兼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俱优的

华夏备受礼敬，被尊为天下之共主，所谓华夏“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7]“汉乘威仪，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顺服者褒赏，叛逆者诛罪。”^[8]而僻居边陲、文化落后的夷狄则横遭卑视，且“以丑名加之”，甚至被骂为禽兽。《说文》：“南方蛮从虫，北方狄从犬，西方羌从羊，此异种也。”^[9]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对华夷观念作了这样的阐述：“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0]明儒黄宗羲则更甚：“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11]

2. 华夷之辨，惟礼是依。华夷之辨源于人们居住区域的阻隔和人们生活习俗的各异。由于居住区域的阻隔，妨碍了人们的相互交往，其结果不仅是导致各地形成各自相异的生活习俗，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如周礼：“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衣、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2]还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这并非意味着华夷之辨是依地域和民族为标准的。华夷观念形成于春秋时期，因此华夷之辨的标准也必须到当时的社会体制中去找答案。周初，为屏藩天下，周王室将中原地区分封为71个诸侯国。为陶冶人们的道德修养，维护等级森严的分封制社会，周王室制定了详尽的礼乐制度，对人们的权利义务按不同等级作了严格的限定，从而形成了所谓的礼乐体制社会。而此时的蛮夷社会则处于“逐水草而居”、“不火食”、“不粒食”的渔猎社会阶段，他们不会也不可能进入这个礼乐体制世界。因此，是否实行礼治就成了区分华夷的主要标准。因此，古人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华夏”连称“谓中国也”。^[13]“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

身礼义，故谓中华。”^[14]明儒何塘曾十分精辟地指出：“中夏夷狄之名，不藉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15]清儒王韬也认为：“自世有内华外夷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夷，此大谬不然也。”因为：“华夷之辨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16]

3. 礼野非恒，华夷无常。尽管人们一般称中原地区为“华夏”，边陲地区为“夷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原恒为华夏，边陲永为夷狄。华夷之分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辩证的华夷观念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1) “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17]“苟有礼也”，“夷狄也进至爵”；“苟无礼也”，“中国也新夷狄”。^[18]这就是所谓《春秋》之法、《春秋》之义。“《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19]“《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20]“大禹出于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21]“周文王生于东夷，大禹生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22]王夫之也曾感慨道：“吴、楚、浙、闽，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藪；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稚钝駉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23] (2)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华夷观念并非认为“中华”、“华夏”始终是文化最先进的地区，“中华”也应向“鄙野”学习。(3) “华夷如一”。既然“华夷无常”，就不应无条件地一味鄙视、歧视夷狄，而应对华夷一视同仁。孔夫子就曾说过：“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24]显然，在孔夫子看来，夷狄虽为不知礼乐的化外之民，但也知言忠信、行笃敬。唐太宗李世民则更进一步指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